

第一章 朝鲜问题的产生

第一节 列强觊觎朝鲜与中朝宗藩关系

一、殖民主义者投石问路

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东亚的初期，朝鲜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家。它除和中国存有宗藩关系，和日本、琉球保有交邻通信关系外，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处于隔绝状态。因而，在西方人的眼中，朝鲜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有人用“隐士之国”(The Hermit Kingdom)来称呼它。

西方殖民主义者觊觎朝鲜由来已久。自 18 世纪末叶起，一些西方国家就经常派遣武装商船到朝鲜的港口和沿海岛屿，强行要求通商。但在当时，列强在东亚开拓市场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和日本，还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对付朝鲜。于是欧洲的天主教徒捷足先登，有效地渗透进了朝鲜半岛。

早在 18 世纪，天主教就经由中国传到了朝鲜。但是，朝鲜的教会只是作为中国教会的一个部分而存在，那里还没有欧洲的传教士。随着欧洲各国对朝鲜欲望的发展，罗马天主教廷也对朝鲜采取了积极政策。1831 年，教皇格里高里十六世宣布设立朝鲜主教区，并任命法国传教士为主教。1835 年，第一个法国传教士罗伯多禄(P. P. Maubant)潜入朝鲜，此后又有两名法国教士接踵而至。他们频繁地开展传教活动，并和一些失意的封建贵族拉上了

关系，在政府官吏中发展信徒。1838 年天主教信徒已达 9000 人。在朝鲜的教会中，聚集了一批对政府不满的人。早在法国传教士潜入之前，一些天主教徒就“欺官吏 犯法律”有的甚至写信给北京的法国教会，请求罗马教皇派遣军队六七万人，驾兵舰前来占领朝鲜。^① 法国传教士的大肆活动，引起民间舆论的不满和官府的注意。李朝政府为巩固统治，于 1839 年 3 月以宪宗名义发布“斥邪论音”实行禁教。于是乔装成朝鲜人的 3 名法国传教士被查出并处死 同时被杀的还有近 80 名朝鲜教徒。

1840 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腐败的清政府抵挡不住英国的坚船利炮，被迫与英国订立城下之盟。美、法两国趁火打劫，与英国一起，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第一批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是当时亚洲最为强大的封建帝国，中国的壁垒被攻破，朝鲜便完全暴露在西方列强面前。

法国早就希望在朝鲜取得军事和商务方面的利益。1846 年，法国政府以 7 年前 3 名法国传教士在朝鲜被杀一事为借口，派出 3 艘军舰到朝鲜进行威胁和试探。这支小舰队的司令塞西罗致书朝鲜政府，要求对杀死传教士一事进行赔偿，并力图使朝鲜口岸对法国商业开放。由于海路不熟，法国军舰没有达到目的，只测量了部分海岸就离去了。1847 年塞西罗经过精心准备率领 3 艘军舰再次进入朝鲜沿海，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当驶至全罗道附近群岛间时，忽有两舰触礁沉没。两舰人员 600 名，全部登上附近的隔音岛。朝鲜官吏对遇险人员进行了救助，供给衣食，同时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事件发生后，朝鲜政府针对塞西罗的无理要求，拟定了一件复文，自北京转送驻在澳门的塞西罗，大意谓：“朝鲜非有恨于大法国与法人，此次法人遭难于海上，我贷之以土

地 保护抚慰 无所不至。然同是法人 如彼教士 变其服 捏其名，昼伏夜出 其所交好 苟非叛贼 即犯罪囚徒 苟非囚徒 即市井无赖，相与窃谋窜入我域内，其居心阴险可知。此犹可忍，其奈我国家之大法何？”^① 这是朝鲜与西方国家首次公文往复。

从 1849 年开始，在朝鲜沿海出没的外国军舰和商船急剧增加。1850 年 2 月，一艘国籍不明的外国军舰对江原道蔚珍、竹边沿岸进行炮击，打死打伤朝鲜群众多人。1851 年 法、美商船分别侵入济州岛大静县和东莱龙唐浦。 1854 年 坚持锁国政策 200 余年的日本，被美国军舰冲开了大门，朝鲜朝野益加震惊。当年，沙俄军舰驶入元山和图们江口一带进行测量。 1855 年 法国军舰对从图们江口到釜山的整个朝鲜东海岸进行了探测。同年，英国军舰和英国商船也分别侵入釜山和通川。1856 年 数百名法国士兵搭乘军舰在洪州古代岛前面的长古岛登陆，对岛上居民进行炮击和烧杀抢掠。此后，这群法国士兵又窜到黄海道丰川沿岸，重复他们的野蛮行径。

当时正是李朝哲宗时代。朝鲜的封建统治者对西方列强的不断来犯深感不安。1860 年，又发生了对朝鲜局势有重大影响的两件大事。其一，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 清政府被迫投降 与英法等国签订条约 许以通商、传教等大量利益。其二，是俄国乘机胁迫清政府订立条约，正式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纵跨 10 余个纬度、面积 1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俄国。俄国的边界，由此直抵图们江口而与朝鲜相接。这些消息接连传到汉城，朝鲜王室大为震动。在他们看来 被奉为上国的中国都败给了英、法、俄这些西方国家 朝鲜的前途，不能不使人担忧。而且，从前远道而来叩关的俄国，忽

张存武编：《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八册 第 704—705 页。

焉已成紧邻 朝鲜外患的危机 已有迫在眉睫之感。

正当西方国家纷纷叩门之际，朝鲜的国势也日益衰败，封建制度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朝廷戚臣当道，士祸党争愈演愈烈，两班贵族的封建剥削更加残酷。朝鲜王室不仅不能励精图治 反而更加肆意挥霍 纵情于声色犬马 国家纲纪益加废弛。由此引起社会激烈动荡 农民起义此伏彼起。

二、大院君的内外政策

1863年2月 哲宗病逝。哲宗无嗣 立年方12岁的李熙为王，是为高宗。高宗的生父李昰应，本为王族支系，这时被封为兴宣大院君，实际上掌握了国家的权力。

李昰应上台掌权，是李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他在哲宗时代受外戚安东金氏的压制，对势道^① 政治及朝鲜王室数百年来的积弊深恶痛绝。他比较了解世俗民情，性格刚毅果断，勇于任事。掌权后，为抑制和打击安东金氏的政治势力，建立以他本人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在内外政策方面多有兴革。

在内政方面，大院君极力废除外戚专权的势道政治，罢黜了金氏集团的一批大臣。为扩大封建王权的统治基础，他改革世代相承的用人制度 标榜“以才择官 四色平等”。所谓“四色”是李朝官僚贵族内部长期形成的被称作“老论”、“少论”、“南人”、“北人”^② 的四个派别。他们以地域和政见的不同，呼朋引类，深相结纳，排斥异己，猎取官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院君对垄断着政府主要官职的老论和少论派采取了抑制政策，安插那些长期失势的南人和北人派出任大臣，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外戚和老论、少论派在地方两班中势力很大。地方两班又以书院为其窟穴。因而，

^① 势道 亦称“世道”，一种外戚专权的政治现象。

书院常常成为两班儒生上下呼应 以所谓‘清议’诽谤国政 制造政治舆论，煽动派阀斗争的地方。书院的创建者因有朝中显宦作背景，随时有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的可能。书院还滥用各种特权，欺官虐民，横行乡里。大院君在站稳脚跟以后，多次对书院进行整顿。1871 年 又公布了《书院撤废令》 宣布只保留 47 所赐额书院 其余 600 余所书院全部关闭。这一举动给鱼肉百姓的地方两班很大打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群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抗。

为了加强王权和树立自己的权威，大院君上台伊始，就着手重建 16 世纪日本入侵时被焚毁的景福宫。为了筹集巨额的建筑费用 他强行征收所谓‘愿纳钱’ 加倍征收‘结头钱’（土地税）还铸造没有任何财力支持的‘当百钱’ 以高出实价 95% 的币值强行流通。自 1865 年至 1867 年 历时近 3 年，每天有数千名工役在工地劳作 耗资 2500 余万两白银，这座庞大的宫殿才告建成。重建景福宫的结果，与大院君的愿望恰恰相反，国库耗之殆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贫困化，因而加速了封建统治体制危机的到来。

1871 年，大院君为了扭转财政困难，废除了实行多年的军布制 而代之以户布制。所谓‘军布制’ 是对普通百姓家 16 岁至 60 岁的男丁征收的一种苛税。在实际征收的过程中，连 16 岁以下的儿童、60 岁以上的老人甚至死者都征税 因而有‘黄口征布’、‘白骨征布’等多种名目 而富有者都是乡任、儒任、校任 没有军布负担。改为户布制以后，地方两班和普通百姓均需按户纳税。同时，还废止了引起民怨的城门税。在大院君执政期间，朝鲜国家财政状况比以前有所好转，国库相对充实。

为了强化封建统治，大院君还下令编纂各种法典，改革一些政令和礼俗。

在对外政策方面，面对日益险恶的国际环境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北方俄国的威胁，大院君政府推行了一种极端的攘夷锁国政策。

首先是严边禁。大院君下令各地官员高度警惕外国船舶的出现 严禁同外国人通商。在对外贸易活动中 加强了检查制度 连清朝经义州进口的北货 和日本经东莱进口的倭货 都严格进行查验 不准在这些货物中夹杂西洋商品。

其次是加强国防。为应付外敌入侵，大院君对军队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废除了名存实亡的备边司，恢复了早已撤销的三军府 在全国各地征募士兵 制造和购买枪炮、弹药和战船 整军备战。在江华岛、乔桐岛、永宗岛及西海岸一带的主要城镇 都修筑了炮台及其他军事设施，并增派军队进行守护。为了抵御来自日本的威胁 加强了东莱一带的防务。为了防止俄国南下 也加强了北方庆兴一带的防务。

其三是禁教。60年代初的哲宗末造，由于政治腐败和惧外心理，一度教禁松懈。天主教乘机在朝鲜境内迅速发展，有法国传教士 13 人进入朝鲜。至 1865 年 教徒总数高达 23000 人。他们一方面从事传教活动，一方面在汉城办学兴医，笼络人心。1864 年以后 由于俄患日逼 有的贵族也加入教会 并上书大院君 要求联盟英、法以防沙俄。^① 在朝鲜统治者看来，天主教会的大规模发展，对朝鲜的国家安全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于是大院君政府下令重申厉行教禁。自 1866 年 1 月开始 在全国各地对欧洲传教士和天主教徒进行了大搜捕。在三年之间，有 12 名法国教士被捕，其中 9 人遇害 有 12 万名教徒被捕，8000 人被处死。

大院君采取如此极端的攘夷锁国政策，除害怕封建统治秩序不稳外，也与朝鲜当时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有一定关系。由于工商业不发达 农业歉收 国内产品短缺 大院君害怕通商会造成国内物资更加匮乏 出现难以支撑的局面。这种心情 在 1866 年（同

治五年 朝鲜国王给清朝的文书中就曾经表露过 而在 1871 年给清朝礼部的咨文中说得更加明白：“从前别国不知朝鲜之风土物产，每以通商之说来缠屡矣。而本国之决不可行，客商之亦无所利，曾有同治五年咨陈者。敝邦之海域偏小，天下之共知也。民贫货俭 金银珠玉 原非土产 米粟布帛 未见其裕 一国之产 不足以支一国之用。若复流通海外，耗竭域内，则蕞尔疆土必将岌岌而难保矣。况国俗俭陋，工手粗劣，未有一件货物可与别国交易。本国之决不可行如此，客商之亦无所利如彼，而每有通商之意，盖由别国远人未谙未详而然尔。”

三、法、美舰队侵朝

大院君的极端排外主义的禁教措施，恰为法国侵略朝鲜制造了借口。当时在朝鲜境内的法国传教士，只有一个名叫利德尔 (F. Ridel) 的侥幸逃出，雇一小船于 1866 年 7 月 7 日到达烟台 第二天即往天津向法国驻亚洲舰队司令罗兹 (P. G. Roze) 作了报告。罗兹急赴北京，向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 (C. H. M. Bellonet) 报告了情况。伯洛内一面致电本国政府，力主用武力攻打朝鲜，一面照会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称：“于本年三月间，高丽国王突发一令，将该处法国主教二人及传教士九人，并本地传教士七人，其习教之男妇老幼无数，尽行杀害。如此残暴，自取败亡。因其系属中国纳贡之邦 是以本国命将兴师 以讨有罪 理合知会贵亲王。”所有本国各路兵船，不日即可齐集朝鲜，暂取其国。后来再立何者为王 以守此土 仍听本国谕命施行。”总理衙门见事态严重 于是复照伯洛内 答应从中排解 反对法国出兵 称：“本爵查朝鲜国僻处海隅，素知谨守，现在未知何故有杀害教民之事。今贵大臣以贵国

台北近代史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 第 175 页。

兴师缘由知照本爵，足征贵大臣敦睦之谊。惟两国交兵，均关民命，本爵既知此事，自不能不从中排解。该国果有杀害教众等事，似可先行据理查询究因何故，不必遽启兵端。”^①接着，清朝礼部又将总理衙门照会移咨朝鲜，以达出面排解之意，并使朝鲜有所准备。

但伯洛内无意等待清政府出面排解的结果，在未接到法国政府训令的情况下，1866年9月就迫不及待地派出了远征舰队进行军事试探。三艘军舰在罗兹的率领下，由利德尔引路，开进南阳湾。进入江华海峡后，溯汉江而上，直抵杨花津、西江。法舰在汉江上测量航道，侦察地形，并向汉城发射了几枚炮弹。汉城军民十分震惊。朝鲜政府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命令御营中军李容熙加强汉江一带的防务。法舰滞留旬日，完成了侦察任务，遂于10月1日返航烟台。

伯洛内原在非洲法属殖民地任武官，具有殖民主义掠夺者的典型性格：粗暴、傲慢、诡谲，还喜欢虚饰浮夸。法舰回航后，伯洛内调集军舰7艘，陆战队600人，正式向驻华外交团宣布封锁汉江下游和朝鲜西海岸。10月13日，罗兹率舰队到达勿淄岛驻泊。第二天，以两舰开抵江华岛，所载水兵在江华岛登陆。

江华岛是汉江口外的一个大岛，上置江华府。岛上树木葱郁，丘陵起伏。山上建有宫殿，为朝鲜国王夏日避暑之地。江华城城垣高厚，营造坚固，环城皆有炮眼。朝鲜军知法国兵至，在城上整装列队，严阵以待。10月16日，法军从正门攻城，炮击之后，以悬梯登城。由于双方武器相差悬殊，江华城终于失守。17日，法军又袭击通津府，府丞李公濂未作抵抗，弃城逃走。

18日，罗兹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赔偿因法国传教

士被杀造成的损失，严惩与该事件相牵连的三个大臣，缔结通商条约。朝鲜训练大将李景夏致书罗兹，郑重声明：“变服微行，窃窥人国，以破其关禁，不问为何国之人，其罪当死，此天下之大法也。”不承认杀教士不当，拒绝了罗兹的要求。朝鲜政府把法国军舰来犯的消息通报全国，调兵遣将，制造武器，加强了汉江下游和西海岸的防务。爱国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政府坚决抵抗。“爱国之士痛论宜全国咸，终乃悬示国门，益决攘夷之志，大旨谓：我国人苟与法夷媾和，不问谁何，皆以逆党论，立诛之。”^② 很多平民群众响应政府号召参加了义勇队。

为了防止法国军舰溯汉江而上占领汉城，朝鲜军队用木筏封锁了汉江。10月26日，罗兹以120人组成的先遣队在江华岛对面的通津海岸登陆，企图向汉城推进。但法兵刚一登陆，就遭到一支仅50余人的朝鲜义勇兵的阻击，法军死2人，伤25人，余者不敢前进，败退舰上。

由各道招募的义勇兵陆续向前线集结。一支主要由北方猎户组成的约800人的义勇兵队，在千总梁宪洙的统率下，登上江华岛，据险防守，并袭击法国军舰。11月7日上午，罗兹派陆战队160人登陆，企图消灭义勇队，并占领全岛。义勇队在鼎足山城阻击敌军，奋力拼杀，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法军死伤32人，抵挡不住，只好退逃甲串镇。11月10日，罗兹决定从朝鲜撤军。他们逃离江华岛时，破坏和烧毁了很多古迹和民居，还抢走大量历史文献和金银财宝。法国这次侵略朝鲜，以失败而告终。

抗击法国侵略的胜利，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斗志，但也助长了大院君为首的朝鲜统治者极端排外主义的情绪，使之不能客观地估

张存武编：《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八册，第716页。

② 同上书，第715页。

计自己的力量和分析世界形势。

美国是对朝鲜发生兴趣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 1845 年 2 月 12 日，美国纽约州议员、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普拉特向众议院提出的《关于开放朝鲜的议案》中就宣称：“这个一向隐遁的国家的港口和市场，对我国商人和海员的事业欲形成刺激的时代已经到来。”^①后来，由于发生对墨西哥的战争和内战，美国暂时未能对朝鲜采取行动。美国正式做出侵略朝鲜的计划始于 60 年代初。“当审议美国从 1865 到 1870 年在东亚取得海军基地的问题时，就曾预定朝鲜为未来的美军基地之一。”^②而美军正式侵朝，则以“舍门将军号商船事件”为导火线。

1866 年 8 月，在天津的美国商人普雷斯顿组织了一个海盗集团，乘坐舍门将军 (General Sherman) 号双桅夹板船开进大同江。船上共有 24 人，其中一人是前一年曾潜入朝鲜传教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托马斯。这个海盗集团声称到朝鲜是为了和平通商。但其中很多人穿着军装，船上装备了两门大炮和其他武器。舍门将军号进入大同江后，遭到朝鲜官员的抗议。但这群海盗置之不理，于 22 日经万景台而上，直至平壤附近侦察地形，准备盗掘平壤附近的古代王陵。传说建都平壤的各朝王陵中，都有大量珍宝和金银陪葬。²⁷ 日，入侵者袭击了监视他们行动的朝鲜船只，并扣押了前来进行交涉的朝鲜监营中军李玄益，开炮打伤 10 余名群众，还抢劫物资，凌辱妇女。8 月 31 日，平壤附近百姓忍无可忍，组织起来，与平安监营的士兵一起，对舍门将军号进行了袭击，把这群海盗从甲板上赶入舱中，救出李玄益，然后放火将船焚毁。普雷斯顿

曹中屏：《朝鲜近代史》，东方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 页。

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下卷，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9 页。

等全被烧死。

1868 年，又发生了一起美国人盗掘陵墓事件。为首者是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詹金斯。他听说大院君的父亲南延君的陵墓中埋藏有大量珍宝，企图盗取。还打算将南延君的尸骨盗出，作为交换条件对大院君进行讹诈，迫使大院君同意美国通商传教，并付出一大笔赎金。他与德国商人奥贝特合谋，组织了一个 120 人的大海盗集团。詹金斯告诉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西华，他去朝鲜的目的，是请朝鲜政府遣使臣赴欧洲与各国订约，并要求讲清舍门将军号船上人员被杀的原因。于是西华为之提供了所需船舶、人员、武器和一切经费。1868 年 4 月，这群海盗乘坐一艘名为中国号的 1000 吨级的商船，携带各种轻重武器，开进牙山湾。在到达担岛后，又换乘小火轮，至德山郡九万浦登陆。他们伪称自己是俄国士兵，袭击了德山郡衙署，抢取军器，然后赶到伽倻洞南延君陵，开始挖掘。由于墓穴坚固，他们没有如愿以偿，加之附近群众纷纷赶来，他们只好停止盗掘，退回船上。

如果说上述两起盗墓事件还只是在美国侵略政策支配下不完全具有官方性质的行动，那么，在这期间，美国政府也已着手进行侵朝的准备。1867 年 3 月，美国国务卿西华德 W. H. Seward 曾向法国建议，两国联合组成一支远征军队征服朝鲜。但法国由于面临普鲁士进攻的危险，对这一计划没有同意。此后，美国以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为由，先后两次派军舰到朝鲜，对朝鲜政府进行威胁。美国公使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积极策划了侵略朝鲜的阴谋。1870 年，美国国务院正式训令，由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 F. F. Low 和美国亚洲舰队司令罗杰斯(J. A. Rodgers)负责侵朝计划的实施。

1871 年 2 月至 3 月间，美国公使镂斐迪多次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转递给朝鲜国王的信件。清政府屈从其请，允为代寄。

镭斐迪在信件中声明，将带一支舰队前往朝鲜，商议订立保护美国商船条约，并威胁说：“本国以和睦来，望以和睦相待。若多方拒绝，实自招不睦。”^①与此同时，镭斐迪和罗杰斯开始调集美国驻泊中国和日本海面的 5 艘军舰，组成远征舰队。舰队携有大炮 85 门，水兵 1230 名，提前集结在日本长崎，在未接到朝鲜国王复书的情况下，即于 5 月 16 日开始向朝鲜进发。

美国舰队于 5 月 23 日开近江华岛，一面测量水道，一面派小股美兵登陆窥探。数日后，朝鲜政府派官员到美舰求见。镭斐迪和罗杰斯以来员无政府委派文凭及品位较低为由，拒绝会见。6 月 1 日，美舰队驶入江华岛内侧，驻守岛上的朝鲜军队进行了自卫。80 门土炮一齐向敌舰射击。美军在狭窄的水面上很难施展，有两艘军舰被击伤。

6 月 10 日，美国舰队再次向江华岛扑来。下午，美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开始登陆，占领了岛上的草芝、广城两镇。朝鲜守岛部队与义勇兵同美军展开激烈战斗。美军凭借火力优势，一连攻占 5 座城镇。但由于朝鲜军民顽强战斗，不断袭扰，美军无法在岛上站稳脚跟，只好撤到舰上，开往勿淄岛。

美军盘踞勿淄岛，一面修理受伤舰艇，一面准备再次发动进攻。朝鲜也采取措施，严阵以待，并封锁美军的淡水来源。经过 20 余日的对峙，镭斐迪终于认识到，企图“诱使朝鲜政府就签订一个条约而进行谈判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②。

法国、美国侵朝，均以失败而告终。大院君认为这是他的攘夷锁国政策的胜利，因而事后命把刻有“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和“戒我万年子孙”字样的斥和碑树立在汉城中心以及全国各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 159 页。

曹中屏：《朝鲜近代史》，第 25 页。

主要城镇。这固然有利于朝鲜民族意识的增强，但同时也助长了排外情绪和盲目自信。

四、中朝宗藩关系遇到的挑战

有清一代，中国与朝鲜之间存有宗藩关系。随着西方列强频频叩打朝鲜的大门，这种宗藩关系也遇到日益猛烈的挑战。

宗藩关系亦即封贡关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旧有的一种国家关系。起源于中国汉代，初行于内部封国，后延及少数周边国家，如日本境内的倭奴等国。至于明代，中国与亚洲几十个国家建有封贡关系。清代的宗藩关系，是明代宗藩关系的遗绪，与中国保持这种关系的国家还有 10 个以上。在这种关系中，中国被尊奉为“天朝上国”，藩属国的君主主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藩属国要奉中国的“正朔”，即使用中国的年号和历法；藩属国君主主要向中国朝廷朝贡。中国对藩属国负有“排难解纷”的义务。当藩属国遭受外敌入侵而求援时，中国要派兵帮助御敌；当藩属国内部发生变乱时，中国也往往应邀出兵，帮助恢复其秩序；而对其统治阶级上层的矛盾，则多采取调解的方式。

宗藩体制是亚洲特有的一种国家关系体制。有人将其称之为“天朝礼治体系”^①。即中国的封建王朝把“礼”的观念扩展到对外关系上，实行儒家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徠之，既徠之，则安之”^②，从而与周边国家缔结了这样一种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体制。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封建的、具有等级制形式的亦即不平等的关系。

黄枝连先生著有《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1995 年出版。

《论语·季氏》。

但是，尽管这种关系以中国为中心，但还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对周边藩属国进行统治。尽管这种体制以“礼”的观念为核心，但也还不能说它靠道德教化来维系。宗藩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周边国家统治者之间，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而缔建的。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说，这种关系接近于同盟关系，中国是其盟主。不过这种同盟关系不是这一体制中所有国家之间互相承诺权利义务，而是各个国家分别同中国发生承诺关系。藩属国由于加入这一同盟，就取得了强大的后盾，减少了遭受别国侵犯的危险，在国内的统治也因此而较易稳固。中国则不仅取得了“天朝上国”的名义，更重要的是保障了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从经济上来说，藩属国实际上把与中国缔结封贡关系当成了同中国进行商品交易的手段。在清代，藩属国的每一次朝贡，都取得清廷的“回赐”。这种“回赐”的原则是“薄来厚往”，一般都比贡品的价值高出许多。而且，由封贡关系产生了朝贡贸易，随同贡使到中国进行贸易的商队，可享受免税待遇，获利丰厚。清政府并不希望藩属国频繁朝贡，而是依据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程度而给他们规定了不同的次数，如朝鲜每年数贡，琉球、越南两年一贡，暹罗三年一贡，苏禄五年一贡，南掌（老挝）、缅甸十年一贡。但这些国家却常常从获利出发，突破定制，增加朝贡的次数。如缅甸在 1795—1800 年的五年中间就入贡 3 次。^① 这些使团在中国，多则经年，少则数月，所有吃住行费用，均由中国负担。清政府为接待贡使，花去大批的人力财力，所以随着经济的衰败和入贡次数的增加，越来越觉得不堪其扰，有时只好加以限制。藩属国同中国的边境贸易，也是这些国家发展经济所非常必需的。

余绳武：《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

由此可以看出，宗藩关系与西方观念中的宗属关系即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质言之，藩属国是独立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内政外交的权利，中国任其自理，一般不予干预，更不在这些国家派驻官员、驻军以及进行经济掠夺。

早在明朝初年，朝鲜李朝的开国者李成桂就受到明太祖的册封。朝鲜的历史学家写道：“李朝统治者把朝鲜与明朝统治阶级的外交关系，看做巩固自己阶级统治和维持政权的一种辅助手段，在处理这种关系时，虽然也有时表现得过于卑躬屈节，然而朝鲜政治上的自主并没有因此而受到过丝毫损伤。”^①这是对中朝宗藩关系的恰当评价。16世纪末叶，日本的封建主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明朝军队应邀赴朝，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经过6年的拼杀，终于把日本侵略者逐出朝鲜。这成为中朝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清朝与李氏朝鲜的封贡关系，始于1637年（清崇德二年），清政府允许朝鲜一年四贡（冬至、正朝、圣节、岁币）说明中国把与朝鲜的关系，看得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都更加重要。清朝与李朝在度过最初短暂的磨合期之后，即进入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时期，直到近代以前，没有遇到过什么意外情况。清政府充分尊重朝鲜的主权，朝鲜对清政府也被认为是“情真谊实，名分不敢稍紊”^②。两国的友好往来有了很大发展，边境地区公私贸易十分活跃。

但是到了近代，中朝关系受到了挑战。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在阴谋插足朝鲜时，总是利用中朝宗藩关系一事大做文章。有的企图否认中国的宗主地位，分裂中朝同盟，反对中国尽其保护朝鲜的义务；有的则表面上承认朝鲜为中国属国，企图假中国之手，

① 《朝鲜通史》上册 中译本 1962年版 第164页。

②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34页。

达到其胁迫朝鲜开放的目的。朝鲜问题，不仅是朝鲜本身的命运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安全。在开始一段时间，清朝统治者表现得懵懵懂懂，毫无识见，胶执宗藩关系的旧制，遇事只是头痛医头 脚疼医脚 不仅不能未雨绸缪 甚且饮鸩止渴 剜肉补疮。其处置不当，约有两点：

首先，清政府对朝鲜没有尽到应尽的指导义务。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洋务运动”发轫的阶段。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些人突然猛醒过来，发现他们所处的时代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们面对的敌人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他们开始承认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是先进的，主张“借法自强”。在行动上，变被迫开放为主动引进，开始郑重其事地同西方国家打交道，向西方学习。从世界大势来看，朝鲜的开放，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大院君所实行的那一套极端保守主义的攘夷锁国政策，最终是要碰壁的。朝鲜既系中国外藩，清政府对它的影响力还是巨大的。从朝鲜的前途出发，清政府应该劝告朝鲜采取较为开放的自强政策。如果这样，1866年1月大院君屠杀外国传教士和天主教徒的惨剧就不会发生；更重要的是，朝鲜如能迅速开放自强，增加了抵御外侮的能力，也许日后不会被当时并不十分强大的日本所吓倒，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江华条约》，最后招致灭国之祸。

第二，清政府在西方国家面前故意淡化中朝宗藩关系，逃避责任。1865年初，法国公使柏尔德密(J. G. Berthemy)曾要求清廷行文朝鲜，令其允许法国传教士前往传教。此后法国多次提出同一请求。总理衙门总是回称：“朝鲜虽系属国，向只遵奉正朔，岁时朝贡，所有该国愿否奉教，非中国所能勉强，碍难遽尔行文。”^① 1866年夏，法国为报复大院君杀死传教士，决定出兵侵朝。7月14日，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9页。

署任法国公使伯洛内在给总理衙门的照会中重复了上述答复，并据以声称：“是以本大臣于存案牢记此言而未忘，兹当本国与高丽交兵，自然中国亦不能过问，因与彼国原不相干涉也。”^① 清政府竟无以作答。1871年奕訢等在会见美国公使镂斐迪时，竟说出朝鲜“虽系属国，但有名无实”的话。此语为美使抓住，大做文章，总署不得不在复照中对此语重加解释。^② 清政府为免除外交上的麻烦，把中朝关系说得若即若离，含含糊糊，似乎宗属关系徒具形式，这显然给觊觎朝鲜的各国留下口实。法国出兵犯朝，就是以总理衙门的话为挡箭牌，阻止清政府出面干涉。此后，日本及一些西方国家阴谋侵朝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不承认清政府所解释的中朝关系为宗属关系。

清政府的这种处置方式，固然与其对外一贯软弱妥协的外交路线有关，但其对宗藩关系的传统观念的固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清政府坚持的只维持宗属名义、对属国内政外交一般不予过问的原则，是宗藩体制的旧原则，只能行之于海禁未开的旧时代。它与起源于欧洲的近代国际法原则是抵触的。按照国际法的原则，一个国家如果在内政、外交上具有完全的主权，那么它就是一个自主国家，而不是别国的属国。如果是属国，它就没有完全主权，宗主国对属国的内政、外交均有干涉之权，特别是外交。这既是宗主国的权利，也是宗主国的义务。当然，清政府没有必要也绝不应该去仿效西方国家，把藩属国当成附庸国。但是，面对西力东渐的世界大势，清政府和李朝政府在处理两国关系问题上，却都应该考虑如何因应挑战，变通旧制，密切关系，加强联合，以对付共同的敌人。然而，清政府与李朝政府对此迟迟未能醒悟。尽管此后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 27—28 页。

同上书，第 234、244 页。